



□ 汤红兵

# 最大的“内陆”不在山川之间,而在思想深处 破除“内陆意识”,摆脱被动等待的地理决定论

苏娜

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社科院中心研究员、湖北省“一带一路”研究院执行院长、支点品牌研究院智库专家



## 地理与经济的“内陆”硬约束正快速消解 作为一种思维模式的“内陆意识”却表现出顽固惯性

在传统工业化逻辑下,“内陆”主要指一种远离海洋与边境线的地理区位,常与运输成本高昂、信息传递迟滞、市场可达性弱等客观发展劣势紧密关联,几乎是“欠发达”的同义语。然而,在新时代交通、信息与市场革命的多重驱动下,“内陆”这一沿袭多年的概念,内涵与指向已发生根本性变化。

一方面,地理与经济的“内陆”硬约束正快速消解。高铁、航空、互联网等构成的立体化现代基础设施体系,极大地弱化了物理山河的阻隔效应。深处腹地也能高效链接全球,曾经的“边缘”地区也能被重塑为全国乃至全球网络中的关键“节点”。比物理连接更为深刻的,是经济逻辑的重构。全国统一

## 思维定式若不能及时破除,便如同无形的绳索 导致在激烈的区域与全球竞争中陷入被动、落于下风

“内陆意识”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观念问题,在历史与现实中都曾带来深刻的教训。思维定式若不能及时破除,便如同无形的绳索,捆绑住手脚,导致机遇错失、动力衰减、发展停滞,在激烈的区域与全球竞争中陷入被动、落于下风。

历史之鉴警示深远。美国学者彭慕兰对近代华北“黄运”地区的经典研究表明,封闭与被动会导致“边缘化”陷阱。有的区域从核心滑向边缘,根本原因并非自然资源骤然枯竭,而是在海运兴起、外部剧变时未能主动融入新体系,思想与行动趋于封闭被动,逐渐与发展主流脱节,从昔日商业繁盛、人口稠密的北方经济“核心”,不可逆转地滑向“边缘”。历史的片段证明,某个区域即使拥有辉煌过去,

## 通过战略主动进行动态塑造 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重构区域价值坐标

破除“内陆意识”,需要系统的思想解放与实践突围,摆脱被动等待的地理决定论,通过主动的战略谋划与深刻的制度变革,重塑区域价值坐标,完成从传统认知中的“内陆”向新时代发展“前沿”的蜕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内一些地区成功转型,就在于主动将自身发展融入国家战略宏图,实现了区位价值的重估。广西借助“一带一路”和陆海新通道,从西南边陲跃升为面向东盟的前沿门户;重庆深度融入国家战略,让内陆腹地成为“出海口”;东北打造面向东北亚的开放合作新前沿,

## 对标更高定位、更高标准、更高要求 “建成支点”是深刻的实践,也是思想的远征

湖北不沿边、不靠海,这些年,通过持续织密“铁水公空”立体交通网络,系统提升开放枢纽功能,塑造了陆海空“三大丝绸之路”交汇的区位优势。

“轨道上的湖北”高铁成网,时速350公里高铁运营里程跃居全国第5。“水运上的湖北”巨轮穿梭,亿吨大港增至5个,居全国内河第1。“航线上的湖北”畅连全球,花湖国际机场累计开通货运航线117条,实现货物“一日达全国、隔夜达世界”。2025年全省进出口总额增长18.2%、增幅全国第3,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比重降至12.82%,低于全国

□ 樊博文

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犹如三座巍峨的精神坐标,矗立于荆楚大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和精神本色。深入理解和把握三大精神的共性与个性,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有助于为湖北加快建设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有力精神支撑。

### 从精神内核中把握三大精神的共性

矛盾具有普遍性,矛盾的普遍性是矛盾的共性所在。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虽诞生于不同历史时期,但它们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蕴含着贯穿其中的共同精神内核。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人民至上,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根本价值立场。大别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开展土地革命,以巨大牺牲和奉献,支撑起“28年红旗不倒”的奇迹。面对1998年特大洪水,广大军民昼夜坚守,以血肉之躯诠释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高于一切的价值担当。面对疫情,党中央统一指挥,无数逆行者舍生忘死,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

“十五五”时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五年,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关乎全局的战略抉择。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区域发展的底层逻辑正经历深刻变革,现代交通与信息网络极大地压缩了时空距离,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断重塑经济地理,但深植于发展观念中的“内陆意识”——即自我设定为远离开放前沿与竞争中心的思维定式与行为惯性——成为抢抓机遇、塑造优势的思想枷锁,仍在无形中束缚着一些地区。

破除不合时宜的“内陆意识”,树立服务于国家大局的“前沿思维”,成为赢得高质量发展战略主动的紧迫课题。

大市场的加速构建,破除了行政区划带来的市场分割与要素流动壁垒,推动商品、服务、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内陆”完全可以成为国内大循环中不可或缺或“战略通衢”和“要素配置中枢”,从被动接受的“末端”,转向主动辐射的“枢纽”。区域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链接与配置资源的能力,而绝对由地理坐标决定。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思维模式的“内陆意识”却表现出顽固惯性。这是一种在长期相对封闭或跟随式发展实践中形成的认知范式与行为模式,核心表征主要包括四个层面:一是“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习惯于面向上级等政策、要资源,将发

展寄托于外部输血,缺乏内生动力;二是“画地为牢”的封闭思维,决策视野局限于行政边界内部,在区域协同发展与对外开放合作中顾虑重重,担心“肥水流入外人田”,倾向于内部小循环而非开放大市场;三是“甘居人后”的跟随心态,在改革创新与战略谋划上锐气不足、闯劲欠缺,不敢为人先,不愿闯新路,满足于对标模仿、亦步亦趋;四是“非开放前沿”的自我定位,主动将自己排除在开放经济与竞合态势的“中心”或“前沿”场域之外,缺乏争当发展高地、核心枢纽的雄心、胆魄与自信。

“内陆意识”本质上是封闭观念与路径依赖在区域治理和经济发展上的集中体现,与开放精神、进取姿态、担当勇气和争先信念格格不入。当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硬瓶颈”被打破,这种内化于心的“软枷锁”便上升为地区发展更关键、更顽固、更隐蔽的制约因素。最大的“内陆”可能不在山川之间,而在思想深处。

简化审批流程、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保护市场主体权益等方面决心不大、力度不强、创新不多,导致要素集聚能力弱化。三是在培育内生动力上“办法少”。过度依赖传统路径和资源投入,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新动能培育方面思路不宽、举措不实,难以形成具有持续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四是在参与双循环中“链接弱”。满足于本地市场或低端循环,在构建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吸引高端要素、拓展国内外市场能力上不足。

这些表现,本质上都是“内陆意识”在作祟——缺乏在新发展格局中争当“前沿”的站位和担当“中心”的魄力,等待观望、畏难避重,习惯于被动接受而非主动塑造。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内外环境复杂严峻的背景下,区域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慢进亦退。以思想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才能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将地理空间的“腹地”转化为发展格局中的“高地”。

时至今日,虽然基础条件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内陆意识”的残余仍以各种形式显现,成为制约一些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集中表现为:一是在抢抓战略机遇上“慢半拍”。面对重大战略机遇,缺乏前瞻研究和主动对接的敏锐性,谋划项目、搭建平台、争取政策时行动迟缓,错失布局先机。二是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欠火候”。未能真正树立“营商环境就是核心竞争力”的理念,在破除行政壁垒、

通过深化与俄、蒙、日、韩的经贸合作,为老工业基地注入新的开放动能。这表明,“前沿”与“内陆”不是永恒不变的地理宿命,而是通过战略主动进行动态塑造的结果。

借鉴成功经验,需聚焦三个根本抓手协同发力:一是强化战略主动,争做关键“支点”与“枢纽”。破除“内陆意识”,首要在于心态与角色的转变,从“等靠要”心态,转向“主动干”的担当,前瞻性谋划,结合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区位优势,谋划在新发展格局中的独特功能定位。勇于担当“支点”“枢纽”“门户”等战略角色,设计重大项目、重大平

1.08个百分点,“九省通衢”加速迈向新时代“九州通衢”。但也要看到,湖北仍有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的使命任务。对照发展的更高定位、更高标准、更高要求,还需清醒头脑进行深层审视:还有哪些思想认识层面的因素制约着支点规模、能级、功能的提升?在争取国家顶层设计、创造引领性发展模式上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增强?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关键节点、畅通经济循环上还有哪些空间要拓展?在培育全球性“链主”企业、布局未来产业上还有哪些空间要拓展?

从立的角度来说,需在四个维度用力:定位之立,从“九

省通衢”的交通枢纽,向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点”和“要素配置中心”升级;开放之立,高水平建设内陆自贸区,积极探索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新规则,成为“制度型开放高地”;产业之立,聚焦优势领域,全力抢占研发、设计、标准制定等高附加值环节,培育在全球产业链中有话语权的“链主”企业;文化之立,塑造更加开放包容、崇尚创新、海纳百川的前沿地域文化。

“建成支点”是一场深刻的实践,也是一场思想的远征。推动从“地理思维”到“战略思维”、从“政策思维”到“制度思维”、从“经济思维”到“人文经济融合思维”的深刻转变,以全球视野审视方位,以进取姿态抢抓机遇,以创新行动破解难题,才能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并服务国家战略,锚定并抵达发展的前沿。

省通衢”的交通枢纽,向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点”和“要素配置中心”升级;开放之立,高水平建设内陆自贸区,积极探索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新规则,成为“制度型开放高地”;产业之立,聚焦优势领域,全力抢占研发、设计、标准制定等高附加值环节,培育在全球产业链中有话语权的“链主”企业;文化之立,塑造更加开放包容、崇尚创新、海纳百川的前沿地域文化。

“建成支点”是一场深刻的实践,也是一场思想的远征。推动从“地理思维”到“战略思维”、从“政策思维”到“制度思维”、从“经济思维”到“人文经济融合思维”的深刻转变,以全球视野审视方位,以进取姿态抢抓机遇,以创新行动破解难题,才能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并服务国家战略,锚定并抵达发展的前沿。

省通衢”的交通枢纽,向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点”和“要素配置中心”升级;开放之立,高水平建设内陆自贸区,积极探索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新规则,成为“制度型开放高地”;产业之立,聚焦优势领域,全力抢占研发、设计、标准制定等高附加值环节,培育在全球产业链中有话语权的“链主”企业;文化之立,塑造更加开放包容、崇尚创新、海纳百川的前沿地域文化。

“建成支点”是一场深刻的实践,也是一场思想的远征。推动从“地理思维”到“战略思维”、从“政策思维”到“制度思维”、从“经济思维”到“人文经济融合思维”的深刻转变,以全球视野审视方位,以进取姿态抢抓机遇,以创新行动破解难题,才能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并服务国家战略,锚定并抵达发展的前沿。

省通衢”的交通枢纽,向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点”和“要素配置中心”升级;开放之立,高水平建设内陆自贸区,积极探索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新规则,成为“制度型开放高地”;产业之立,聚焦优势领域,全力抢占研发、设计、标准制定等高附加值环节,培育在全球产业链中有话语权的“链主”企业;文化之立,塑造更加开放包容、崇尚创新、海纳百川的前沿地域文化。

“建成支点”是一场深刻的实践,也是一场思想的远征。推动从“地理思维”到“战略思维”、从“政策思维”到“制度思维”、从“经济思维”到“人文经济融合思维”的深刻转变,以全球视野审视方位,以进取姿态抢抓机遇,以创新行动破解难题,才能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并服务国家战略,锚定并抵达发展的前沿。

省通衢”的交通枢纽,向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点”和“要素配置中心”升级;开放之立,高水平建设内陆自贸区,积极探索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新规则,成为“制度型开放高地”;产业之立,聚焦优势领域,全力抢占研发、设计、标准制定等高附加值环节,培育在全球产业链中有话语权的“链主”企业;文化之立,塑造更加开放包容、崇尚创新、海纳百川的前沿地域文化。

“建成支点”是一场深刻的实践,也是一场思想的远征。推动从“地理思维”到“战略思维”、从“政策思维”到“制度思维”、从“经济思维”到“人文经济融合思维”的深刻转变,以全球视野审视方位,以进取姿态抢抓机遇,以创新行动破解难题,才能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并服务国家战略,锚定并抵达发展的前沿。

省通衢”的交通枢纽,向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点”和“要素配置中心”升级;开放之立,高水平建设内陆自贸区,积极探索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新规则,成为“制度型开放高地”;产业之立,聚焦优势领域,全力抢占研发、设计、标准制定等高附加值环节,培育在全球产业链中有话语权的“链主”企业;文化之立,塑造更加开放包容、崇尚创新、海纳百川的前沿地域文化。

### 正确政绩观的“三重境界”

政绩观是对政绩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是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从政行为中的具体体现。政绩观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根本上决定着履职尽责的方式与成效,是检验党性宗旨的重要标尺。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干事创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干。”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产党人对历史、对人民、对事业的根本态度,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内涵。作为党员干部,可从三个方面提升认识,深刻把握“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与“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之间的辩证关系,始终锚定为民造福的根本标准,以过硬党性锤炼正确政绩观。

一是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不必在我”,就是妥善处理好大我和小我的关系,处理好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个人抱负、个人利益的关系,正确看待长期政绩和自身发展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为党的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这明确告诉我们必须把大我放在小我之上,把长远利益、集体利益和根本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我们要坚决摒弃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始终坚持以基础性、长远性工作用心用力、深耕细作,甘于并善于做那些打基础、利长远的“潜功”,而不片面追求短期速效、表面光鲜的“显绩”。必须将工作的核心价值与首要方向,定位于谋求根本的长远利益、维护广泛的集体利益和保障坚实的根本利益之上,自觉把个人岗位职责、部门目标任务与整体发展大局紧密衔接起来。要主动将工作实践融入人民群众最迫切、最现实的需求之中,使每一次努力都成为惠及长远、造福群众的正向奔赴。

二是挺膺“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这是精神境界与历史担当的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6次考察湖北。2013年7月,他到湖北考察时就提出,要“努力把湖北建设成为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2024年11月,总书记再次来到湖北,提出“加快建设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湖北锚定这一目标,以此作为工作的总战略、总抓手。支点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届接着一届干。去年新春第一大会上,省委提出了支点建设“一年开新局、五年大变化、十年结硕果”的目标,从十年的长时段来谋划支点建设。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最终成功的果实由哪一代人摘取,取决于历史进程和主客观条件的综合效应,但每个历史阶段的努力都是不可或缺的,都要持之以恒,以“功成必定有我”的强烈历史使命感,以每个人每个阶段的努力助推支点建设。

三是秉持“功力必不唐捐”的人生信条。古汉语成语词典中有一个成语“功不唐捐”,由此衍生出一句格言“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意思是,每个人不一定能收获最后的成功果实,但每一阶段的努力都不会白费。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付出艰辛努力,这份努力也一定会有回报。在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中,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岗位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位党员干部都应牢记,每一份付出、每一次努力都不会白费,都是为党的事业助力添彩。涓涓细流,终会汇入大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这鼓舞我们务必珍惜每一天的光阴,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以最大的努力,兢兢业业、用心用力把自己的职责履行好,以开拓创新的姿态,让工作有变化、有成绩。一个人是浑浑噩噩、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还是精益求精、向新向上干出彩,做出的工作成效肯定是截然不同的。“十五五”时期是湖北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聚力突破、全面提升的关键时期。广大干部群众秉持“功不唐捐”的信条,以“日拱一卒”的恒心与毅力,持续积累、不懈奋斗,在平凡岗位上追求卓越,就一定能够通过扎实工作贡献应有的力量。

(作者系十堰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 深入把握三大精神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始终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也是我们党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根本思想武器。在大别山革命斗争中,党根据敌强我弱、地势复杂的实际,选择在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山区建立根据地,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抗洪抢险斗争中,广大军民坚持科学防洪,依据气象水文数据精准调度、有序转移。在抗疫斗争中,党中央根据病毒变异动态调整防控策略,每一步都基于实践和科学。

始终彰显敢于斗争的意志品格。敢于斗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大别山革命斗争中,面对敌军和恶劣环境,广大军民毫不畏惧,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奇迹。在抗洪抢险斗争中,军民“誓与大堤共存亡”,以死守决心夺取胜利。在抗疫斗争中,无数逆行者主动请缨,义无反顾向险而行。

从斗争实践中把握三大精神的个性

矛盾具有特殊性,矛盾的特殊性是矛盾的个性所在。三大精神的形成,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伟大斗争,呈现出各具特色的斗争实践形态。

斗争对象存在差异。在大别山革命斗争中,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表现为阶级压

迫与民族矛盾交织下的政治军事对抗。抗洪精神形成于1998年特大洪水之际,斗争对象是破坏性极强的自然力,考验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自然灾害面前的组织能力。而抗疫精神形成于世纪疫情突袭之时,斗争对象是未知的新冠病毒,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斗争时空场域存在差异。大别山精神诞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的革命根据地,其孕育和发展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创建红色政权的武装斗争实践紧密相连,具有鲜明的革命烙印和地域特色。抗洪精神集中形成于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时期,经历着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等重大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其背后是新中国水利建设成就和举国动员体制在和平年代的集中展现。抗疫精神则淬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凝聚于应对全球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复杂斗争,体现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实践。

斗争方式存在差异。大别山精神的斗争方式,以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群众动员为主,靠的是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运动战,以及“唤起工农千百万”的深厚群众基础。而抗洪精神的斗争方式,是一种军民协同、科学调度、工程防御与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系统性行动,强调人防与技防并重。抗疫精神,则融合了如大数据溯源等现代科技力量、联防联控

等精细化社会治理手段,是一场依托科技进步与制度优势的精密阻击战。

### 把三大精神转化为推动支点建设的磅礴伟力

广大党员干部要通过深入把握三大精神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系统回答好“为谁创造、创造什么、怎样创造”这三个根本问题,让三大精神内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思维方法与工作方法。

回答“为谁创造政绩”,在于恪守三大精神共有的“人民至上”底色。真正的政绩必须经得起群众检验,要把群众口碑作为最硬核的政绩,把民生温度作为最实在的发展指标。

回答“创造什么样的政绩”,在于汲取三大精神个性的实践特质。真正的政绩,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实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潜绩上,要靠“功成不必在我”的韧劲、“防患于未然”的定力、精准施策的智慧来实现。

回答“怎样创造政绩”,在于立足实际、担当作为。三大精神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斗争精神提醒我们,政绩创造没有千篇一律的模板,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既要敢闯敢试,又不能脱离省情民情;既要只争朝夕,又不能急功近利搞“一阵风”。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